



1

1985

近代史 研究

JIN DAI SHI YAN JIU



1979年10月创刊

1985年

近代史研究

1

(双月刊)

总第25期 1月出版

李大钊的三篇佚文…………… (1)

珍贵的历史文献

——读李大钊的三篇佚文……………韩一德 (11)

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段云章 周兴樑 (20)

革命根据地发展时期银行事业概述……………姜宏业 (53)

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及影响……………刘志强 (68)

论新桂系的形成及其统一广西的

历史意义……………黄宗炎 韦春景 (101)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君 (125)

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魏楚雄 (136)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何志功 (151)

竺可桢——中国近代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典范……………许良英 (163)

试论清中期的“夷欠”问题……………林廷清 (174)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茅海建 (196)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日)井上清 (218)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耿云志 (245)

· 问题讨论 ·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兼与胡绳同志商榷……………王来棣 (275)

• 读史札记 •

- 也谈巴西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 秦 生 (300)
- 关于决定创办《向导》时间的考订..... 徐有礼 (306)
- 读史札记二则..... 伊 杰 (309)

• 史学动态 •

- 全国首届史学理论讨论会述要..... 吴 明 (312)
-

李大钊的三篇佚文

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

北京大学教授 李守常

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只要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还要受资产阶级意志统治的这种时代继续存在，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的正是这种由资产阶级时代向无产阶级时代转变的历程，也可以说，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

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虽然还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最近时期内的表现就是拥有两万多名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坚持罢工三月有余的香港海员罢工同盟。在工会组织还不够发达的中国，香港海员工会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成员，握有如此丰富的基金，并且一旦向资本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条件，就不管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和苦战都要坚持斗争到底，有这样一种集体团结力量，加上每个罢工成员那种团结心和坚韧力以及由此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都将会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各地的各种团体以强而有力的鼓励和支持。

这次罢工之所以能够实现工人的斗争目标，固然是依靠了香港海员工会本身的力量，然而不容忽略的是，对于初次举行的这

• 原编者按：最近中国也已建立起工会等组织，以至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劳工运动，为此我们访问了中国劳工问题专家、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氏，请他就中国的劳工问题的现状和未来，谈了如下意见。（昏迷生）

样大规模的同盟罢工从一切方面即物质的、精神的等等方面所给予的支援也是必不可少的。仅举一例来说，即使是尚处于分散状态的小组织林立，很不容易取得一致行动的上海各个工会组织，也极力劝阻了准备取代香港罢工船员的工人赴港。与此同时，各团体还几次募集捐款以支持海员罢工的持久斗争。京汉铁路的工会组织，尽管与香港远隔两地，也凑集了工资的几分之一作为捐款送往香港，还有些组织或派代表前往声援或筹集捐款给予资助，其数目之多已达惊人程度。这一次香港海员罢工的成功确实是与海员工会的团结力量和全国各团体的支援分不开的。因此香港海员工会的胜利，将会给当前在工人中正方兴未艾的工人联合的思想——即使面对具有绝对势力的资本家，只要依靠团结的力量总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那种工会主义思想，增添巨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完全可以相信它必定会促进各地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关于海员罢工暂时就说到这里，现在再来看一看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情况。

就当前看来，不管怎么说，工会组织要属长江流域和广东一带比较先进，至于北方，几乎见不到象样的工会组织。上海的工人团体拥有的人数虽然相当不少，工会的数目也非常之多，不过这种小团体的分立的状态，一旦需要采取共同行动时就有许多不灵便之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小团体的分散存在，又会有利于工会组织和团体运动的发展。

再看广东的工会，这是中国工会团体中居于先进地位的地区，这里不仅有一般的机械工人工会等，而且还有茶业工人工会、木工工人工会、女界职业运动会等。广东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中国工人最先采取强硬态度的罢工，由此难免使人想起，先前在上海被查封以后又搬到广东，因此而迟误了三个多月才出版发行的《新青年》等，它所主张的思想对促使这次罢工的迅速发展和采取强硬态度所发生的某种影响。

长江上游（应为中游——译者注）的汉口，工会组织也有相

当的发展。不过象本月二日发生的男接线员为排斥女接线员而举行罢工一类事件，若从一个方面看，有人可能认为这反映了工人运动颇为幼稚的思想水平，此等行为只能对资本家有利；其实，这种看法不过是一种片面和表面的观察方法，因为不论是汉口的排斥女工、还是广东的男工反对雇佣女工等，都有力地说明了职业妇女出现的事实。只有通过这一事实才能增强妇女对职业的强烈观念，才能培养出维护团结的精神，所有这些都是促进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历，也只有如此，才能加速妇女职业团体的建立和日益增强其团结的力量。

在中国的北方，由于工业不发达，可以说工会组织，还没有一个达到值得一提的程度，能够勉强列举出来的不过是京汉线、京绥线及其他各条铁路线上职工的工会组织。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除开上述铁路工会之外，在天津、北京就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会组织了，尤其在北京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工会组织；然而随着工业的逐步发展，职工人数也会随之增加。他们的知识也在不断增进，必然会感到组织工会的必要，随着也就会进一步地知道团结起来提出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事，从而工会组织的不断增加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开展，自然地必将获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

以上意见是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参考，单靠记忆所及说的，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写出更详细的意见。

（原载《北京周报》第八号，1922年3月12日）

韩一德译 穆传金校订（1984年9月）

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

北京大学教授 李大钊

在上海最先会见了孙文先生，孙先生首先从北上问题谈起，他认为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我之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对中国处在如此混乱状态之下的这种局面，我时常在考虑解救它的方法，我以为应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这是促进统一的最好方法。我决不承认现在这样的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应当一面采取集中兵力于中央的办法，一面扩大县的自治权力，从而削弱现有督军的权力。

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总之，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

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之后到了洛阳。回到这里后听到种种风

* 原编者按：李氏利用暑假游览上海、洛阳等地，会见了孙文、陈独秀、吴佩孚及各地的工人等，于十二日夜返抵北京。翌日他向访问的记者就与孙吴两氏会见时谈及中国统一方策问题发表了下述意见。

言风语，说什么奉直还将再战，吴佩孚要移驻郑州等等，但在洛阳期间一点儿也看不出有这种迹象。至于移兵郑州一事，将来怎样无法预测，但在近期内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动静。眼下吴氏正在热心地实践他那前些时刚刚公布的兵工政策，早上五点钟就全体起床出动操练到七点，然后再到附近的山上植树。吴氏说：如果孙文先生肯出任兵工会的会长，那么他自己愿意担任副会长，率领现有的数十万士兵开到大西北新疆青海一带去开荒种地。另外，孙吴两氏还就前几天报上披露的、近日刚刚收到的徐树铮致吴佩孚论述统一方策的信谈了他们的意见。

下面将就此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联省自治或联邦制度，作为制度本身不一定就不好，然而象现在这样有督军在各地实行割据的情况之下，要想直接实行这种办法那是行不通的。首先在中央必须备有强大的兵力，然后依靠这种力量削弱各省督军的武装，与此同时还要承认县的自治权力并不断发展这种权力，这才是最上策，在这一点上孙吴两氏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当一接触到如何向中央集中强大的兵力，又如何去削弱各督军的权力时，就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了。现在我国的形势与日本相比较，很象明治维新当时的状况，不过日本当时确实有过真正的军阀，这就是被称为长州、萨摩这样强有力的藩主，这些藩主协同一致推翻幕府，也就是推翻了支持军人的那些藩主，把国家政权从“武家”手里夺取过来。但在我国并没有这样真正的军阀，在现有掌握兵权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把政权从军人手中移交给人民，把自己也变成人民中的一员参加进去。看来，我国的现状倒不在于因有军阀而苦恼，苦恼的倒是没有真正好样的军阀。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没有这种真正的军阀，倒可能相对地加快统一的步伐。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我国能称得上是军阀的人们，即那些被称为督军、师长的人们，都不是真正的军人，只不过是一介商人而已。一个普通的商人只能从倒卖商品中取得盈

利，而督军之类的特种商人，却是通过培植个人权力和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收取苛捐杂税的办法谋取私利。因而对他们来说，维护权力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其真正的目的是用所占有的权力谋求个人的利益。倘若一般的民众都觉悟起来，使他们觉得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捞取利益了，那他们就会马上离开那个职位，就象王占元之流，当他把数百万（据传如此）家产弄到手之后，一旦发觉再象以往那样捞钱已十分困难时，便立即离开了他的职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只有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各督军等盘剥私利，这才是削弱督军权力最有效的方法。不过发动民众并不那么容易，这里也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用财政手段使督军失去养兵的力量。向来只要中央政府的财政稍有结余，就被各督军取走，所以不管有多少钱中央总是要陷在财政艰难的困境中，加上因各省督军的权势不见削弱，因而各国虽然几次答应贷款，仅只停留在反复表态上，据说大宗贷款是不会答应的。现在已与几年前大不相同，只要中央能有数千万的收入，把各督军的兵力集中到中央手里是不难办到的，就是说现有各督军，凡他们自己所能筹集到的军费都由自己筹集，每个师团都要有几个月以至十几个月的缺额，如果明确规定这些军费由中央来支付，那么各地的士兵必将拉起队伍向中央集中，到了那时，各地督军会不会因害怕自己兵员的减少去谋求军费自给来挽留其兵士呢？正如前面说过的，各督军既然作为一介商人而存在，就决不会把已经装进腰包的钱再倒出来。假如今后督军割据的状态再继续十几年，那时的情况会怎样虽不可确知，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一些督军由于深知自己将会当不成军人，所以绝对不会把中饱私囊的财物再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各督军的兵力自然要向中央集中，地方的兵力必然逐渐削弱。一旦兵力被集中于中央之时，就可以对其一部分加以真正的军事训练成为中央的军队，而将其余的大多数用于开垦矿山等使用，这样一来统一也就自然形成，剩下来就只有东三省和广东的问题了。可以想见，只要中部地区的各种力量都集中于中央一处，

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能与之相抗衡。然而实行这一计划如果没有数千万元的资金也就只能作为一纸空谈而告终。我们应当采取的，只能是逐步实施的办法，必须首先唤起民众的觉醒，然后还必须依靠民权运动的力量来削弱督军的势力。目前各地的工会组织已在考虑这一问题；商会、农会等虽还未形成公开的运动，但由于各地捐税过重，又都深受军人之害，只要对此持反对态度，运动一经发动，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把督军们赶下台。而且由于各地深受军人飞扬跋扈之苦，都深切期望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出现，世界各国也都盼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些希望之变成现实，也许要花费一些时间，但统一政府的出现已是必然的明显的事实，我们应为它的出现而努力。

（原载《北京周报》第卅三号，1922年9月17日）

韩一德译 穆传金校订（1984年9月）

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

北京大学教授 李大钊

自政变以来，有相当多的议员往上海天津去了，其准确数目虽不得而知，但在北京召开宪法会议却似乎已成为泡影。有些人以为，滞留北京的议员都早已被违背国民意志的直系收买了，如若在上海召开国会，有可能代表人民意志。然而依我所见，不论是跑到天津上海的、还是留在北京的议员，无一不是被收买了的，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民意的。留在北京和跑到天津上海两者之间，只有被直系所收买或者被黎派、段派、张派所收买的区别，而在依靠金钱支配行动这一点上则毫无二致。因此我断言，不论是在

* 原编者按：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并根据南方各地形势的变化，亲自观察了上海总商会对时局的态度和全国工会救国大会的情况的李守常先生，最近对时局发表了独到的根本性的评介。

上海天津的，也不论是在北京的，现有这些议员没有一个是民意的代表者。

这些议员自民国元年被选出以来，在这十余年当中的所作所为，无非是竭尽全力愚弄国民，要尽花招营私舞弊罢了。如果让国民毫不掩饰地谈他们对现有议员的感想的话，他们必定会说，对于如此极端违反国民意志而到如今仍然坚持这种态度的议员们，国民是不会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代表的。多数国民之所以对这些议员在做些什么并不关心，是因为议员与国民意志之间存在很大距离的缘故。因此，即使在北京的宪法会议开不成；或者在准备去上海、杭州直系统治不到的地方去召开这种会议的所谓南方国会案同样告吹之时，这对大多数国民来说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综观前些时在上海召开的两个会议，即上海总商会临时会议和全国工会救国大会，全国工会救国大会虽然通过了敦促国会南迁和动员全国人民组织民意政府等种种决议，但是仅仅有此两项决议，即使能够敦促国会南迁，但究竟能否根据国民意志建成民意政府，人们不加思索即可作出判断，因为这个会议本身就是被许多政客操纵的，它的决议极不彻底，因此并无任何权威可言。我认为在他们的十项决议中，除二三项以外，其余都是违背多数工人意志的。

与此相反，上海总商会由于近来逐渐吸收了可靠的新思想，所以在其决议中还可以看出一些民意来，这就是宣布不承认非法摄政和曹锟的大总统资格的同时，又作出了国会议员不能代表民意而其一切行动都是无效的决议，这证明了总商会在最近时期内确实有了新的觉悟。目前在我国，军阀之害固然严重，政客之害也不能说轻，因此我们如不在反对军阀的同时也反对政客，就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

关于今后的问题，总商会只说要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来讨论进行的方法，而对这个民治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具体细节并没有

做出一字交待。如果让我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既然国会议员诸君早已不是民意的代表者，他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开会，也都可能算是国民的代表机关。所以当前必须着手组织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这个机构究竟由什么人来组织才最合适呢？只有由全国的商会、农会、工会、学生会及其他团体中推出适当人数来组织，才是唯一的途径。有一部分人主张由各省的省议会推出代表来组成，它的建立也就比较容易，而且，各省又能无遗漏地选出代表，这是最便当不过的了。然而所谓省议会本应是维护各省本身的利益的组织，换言之，它必须是为本省谋求利益的组织，但实质上却与这个本来的目的相反，而多为各省有势力人物所支配。例如直隶省就要受曹锟等所左右；湖南的省议会则是由赵恒惕的部下组成的。因此，各省省议会的现状都极为混乱腐败，它和根本违反国民意志的国会没有任何区别，因此还想要由省议会推出代表组织新的什么会，那就必定是一个纯粹反对民意的机构。我们要想组织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就应当从根本上着眼，即必须由商会、农会、工会等的代表来组织。

然而，也许有人认为 你所说的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自己也完全承认，我刚才说的真的就是一种理想。不过迄今给政界带来如此混乱的正是现实之中的实际发展而来的罪过！因为人们若想实际的而又迅速的实现点什么，就必定要去依靠有一定实力的人，但是那些有实力的人们却马上会靠他的实力为自己创造方便捞取好处，于是终于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境况。所以为了匡正这种混乱状态，那怕会面对怎样的迂回曲折，遇到怎样的重重困难，除了奔向理想之一途别无他路可走，而由商会、工会、农会及其他真正代表人民机关的代表来组成治理全国政治的机构虽是困难的，然而毕竟是已朝向那个目标在向前迈进着，这就是既有由商会出面联合全国各地的商会，为筹建这种组织正在尽心尽力；又有去年成立的民权同盟会也在朝向这个根本目标开始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还有去年重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决定

排除政客，集中真正愿为国民尽力的战士而进行活动。上述商会、民权同盟会、中国国民党等的运动虽然发动得很晚，然而毕竟是已在进行过程中，可以想见在几年之后，必定会组织起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因此关于今后政治运动的发展趋势，如果用一句话来评断，那就是：广大人民必将在这场运动中把一直欺骗人民、代表军阀政客私利的政治权力夺回到人民自己的手中。

（原载《北京周报》第七十四号，1923年7月22日）

韩一德译 穆传金校订（1984年9月）

珍贵的历史文献

——读李大钊的三篇佚文

韩一德

不久前在大连图书馆查阅二十年代的历史资料，从该馆所藏《北京周报》中发现了李大钊的三篇重要文章。《北京周报》是1922年1月由日本人藤原镰兄在北京创办的日文刊物，李大钊与这个刊物有密切的关系。据山道健太朗所著《巴黎公社一百年与日本》^①一文中介绍，李大钊于1920年10月曾加入日共的前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在名册上并注有李大钊领取该同盟宗旨书五十本的记载。在这个同盟里李大钊就结识了后来成为《北京周报》主要记者的丸山昏迷等人，丸山昏迷在北京经常进出李大钊的寓所，征求他对时局的评论。因此李大钊曾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同时，鲁迅、周作人、成仿吾等也与这个刊物保持密切联系，发表了大量著述，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也有文章在这里发表。

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过去已经发现的有：《宗教妨碍进步》，《北京周报》第十二号，1922年4月9日；《实业改造的中心势力》，《北京周报》第六十六号，1923年5月17日；《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北京周报》第八十号，1923年9月16日。这次发现的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北京周报》第八号，1922年3月12日；《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北京周报》第三十三号，1922年9月17日；《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北京周报》第七十四号，1923年7月22日。

已经发现的文章都署有北京大学教授李守常或李大钊的名

① 《パリ・ユミエーン百年と日本》，《图书》1971年8月号，岩波书店出版。

字，从编者按和行文口气上分析，可能是记者采访时李大钊的谈话记录，由记者整理而成的。目前已见的仍不是《北京周报》的全部，估计在散佚的部分里可能还会有李大钊的文章。这次发现的三篇文章，不仅对考察李大钊的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将有一定的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工运史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下面对三篇文章分别作一简单介绍：

（一）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趋势》一文

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这次斗争坚持了五十六天，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对全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趋势》一文就从这次海员罢工谈起，认为这次罢工是中国卷入由资本主义时代向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转变的世界历史潮流的标志。在工会组织不发达的中国，香港海员工会能够拥有这样多的成员，掌握如此丰富的基金，并且具有坚持到底毫不动摇的集体团结力量和它所取得的胜利，无疑会给各地的工人团体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预示着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必将到来。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香港的海员不仅受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压迫，而且受包工制的盘剥，工资十分微薄，生活非常痛苦。又由于他们往返于世界各港口，比较容易接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阶级觉悟较高，罢工要求迫切。以苏兆征、林伟民为首的先进分子，受到国内五四运动后革命形势的鼓舞，便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着手组织工人的战斗机关，1921年3月香港海员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宣告成立，它成为这次罢工的战斗司令部。这说明香港海员罢工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必然性，

所以它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李大钊在分析这次罢工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一方面固然是依靠了香港海员工会本身的团结战斗；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了各地工会团体所给予的巨大支援。在罢工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各地工人从各方面进行支援，以上海为例，在当时工会还处于小组织林立，很不容易取得一致行动的情况下，仍然成立了“上海香港海员后援会”，这个组织劝阻了准备取代罢工船员的工人赴港。远隔香港的京汉铁路工会在长辛店发起组织“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得到京奉、京绥等各路工人的响应，收集了巨额捐款送往香港。其他各地的工人也派代表前往声援；至于募集捐款的团体数目达到惊人程度。李大钊认为，这一事实对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使之迅速走向联合，对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接着，他分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首先指出长江流域和广东是中国工会运动比较先进的地区。在广东不仅有一般的机械工人工会，而且有茶业工人工会，木工工人工会以及女界职业运动会等。广东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中国最早采取强硬态度的罢工。在这里，他指出不能忽视上海迁往广东的《新青年》对广东印刷工人的影响。

他还对上海工会团体小组织林立的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这固然不利于工人阶级采取共同行动，但同时这种小型组织的分散存在，又有益于联系和团结广大工人，发展工会组织。

关于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形势，他特别注意到1922年3月2日在汉口发生的男接线员排斥女接线员的罢工。有人认为这种罢工只对资本家有利，它反映了工人运动思想水平的幼稚。李大钊却深刻地指出了它的另一方面，即类似事件说明了职业妇女出现的事实，只有如此才能增加妇女对职业的强烈观念，培养维护团结的精神，加速建立妇女职业团体，这又是促进工人运动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总的来说，他对南方工人运动评价较高，而对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北方工人运动则认为还不够发达，除了京汉铁路工会的活动有相当成效之外，天津、北京还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会组织。但他同时又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职工人数的增加和他们知识的增进，北方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从香港海员罢工谈起，全面分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既指出了这个运动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也指出了它将获得日新月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特别对上海工会的分散状况和武汉男工排斥女工的罢工，作出了客观、全面、辩证的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显示了他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水平。

还应指出，李大钊介绍国际工人运动和“五一”劳动节的文章有好几篇，也写过关于唐山矿工生活的文章，但全面分析中国工人运动的仅有这一篇，它对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有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中国统一的方策 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一文

1922年8月中旬，李大钊到上海出席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马林带回的共产国际的决议，集中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人。在这次会上李大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努力促使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会后他曾与林伯渠一起会见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①。孙中山在困难的处境里，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不久由他亲自主盟，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这之后的9月8日，李大钊自沪抵洛，在洛阳期间会见了吴佩孚，曾与白坚武“畅谈申江近情及南北政情”^②。《中国统一的方策

① 李大钊：《狱中自述》。

② 《白坚武日记》第十八册。